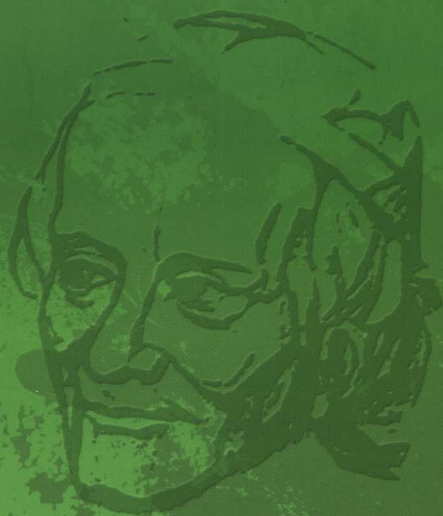


◎ 貴州大學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文库

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

——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

林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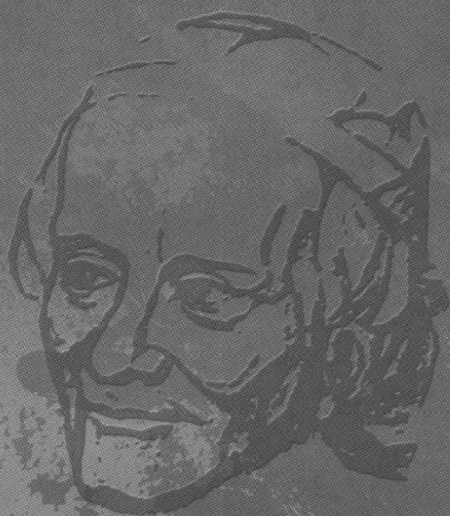
貴州人民出版社

◎ 貴州大學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文库

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

——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

林 芊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 / 林芊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221 - 07143 - 8

I. 历... II. 林... III. 伏尔泰, F - M. A. (1694 ~ 1778) - 史学 - 思想评论 IV. K09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639 号

责任编辑: 何怀德

封面设计: 点石图象

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

林 芊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中华北路 28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21 - 07143 - 8/K · 898

定 价 25. 00 元

目 录

绪 言	1
一 20 世纪国外的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	2
二 20 世纪中国的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	11
三 本书的意义、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7
第一章 为克莱奥重铸辉煌	38
——伏尔泰的史学生涯	
第一节 从史诗到史学:早期的历史著作	38
历史怀疑论的种子〔38〕 巴士底狱与《亨利亚特》〔39〕	
流亡英伦与《查理十二史》〔43〕 《哲学通信》中开始的史学	
思考〔50〕 拯救法国的《奥尔良姑娘》〔51〕 推翻国王的《布鲁图斯》〔52〕	
第二节 《路易十四时代》开创了历史学的新纪元	53
开创史学新方向的《路易十四时代》〔53〕	
第三节 史学的阿尔卑斯山:《风俗论》	60
在西雷的历史研究〔61〕 《风俗论》的成就〔63〕	
第四节 帝王的史师:后期历史著作	66
应哥达夫人所作《帝国编年史》〔66〕 提献给女皇的《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史》〔66〕 路易十五的史官与《路易十五时代概要》〔68〕	
第五节 启蒙史学的泰斗:伏尔泰历史著作当在时的影响	69
《百科全书》历史词条的撰写〔69〕 《英国史》的作者休谟与	
伏尔泰〔70〕 普鲁士国王斐特烈的评论〔70〕 《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本与伏尔泰〔70〕 富兰克林翻译伏尔泰全集〔70〕	
哥德谈伏尔泰〔70〕	
第二章 矛头挥向披着小圆衣的主教和暴君	73

——伏尔泰历史研究中的社会批判		
第一节	矛头挥向披着主教小圆衣的暴君 封建制度与法国的耶稣会教士〔73〕 两个劲敌：吉永教士、 弗勒龙教士〔76〕 《文艺年鉴》 剥弃摩西神性的外衣〔84〕	73
第二节	矛头挥向封建制度 莫普改革与《高等法院史》〔88〕 七年战争与《路易十五时代 概要》〔90〕	88
第三章	正是洛克统治着我的心	95
——伏尔泰的理性史学		
第一节	理性、历史理性 伏尔泰的历史出发点：理性〔95〕 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96〕 理性在古典时代〔98〕 中世纪的理性〔99〕 启蒙理性〔100〕 伏尔泰的历史理性〔101〕	95
第二节	理性史学 用理性的眼光去透视人类的一切活动〔107〕 历史研究要揭 示宗教历史的野蛮与虚伪〔109〕 迷信宗教最终被人类理性 所取代，这就是史学的真正意义〔113〕	106
第三节	伏尔泰理性史学的评价 理性史学对后来史学理论的影响〔115〕 奠定了史学本质的 基石 将历史从柏拉图那里解放出来 无须提出基督教所说的 “起源与终结”的命题 潜伏了历史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的 纷争 理性史学对宗教历史批判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118〕 宗教批判史的地位——伯尔的历史怀疑与伏尔泰的历史事实 与进步 伏尔泰的理性宗教〔120〕 自然神论：启蒙思想对 宗教迷信批判大合唱中的个性奏鸣曲、法国启蒙思想与英国 启蒙思想的交汇	115
第四章	历史的中心点乃是近代科学的旭日东升	131
——理性史学的认识特征和方法论根源		
第一节	启蒙时代的一般方法论特征 科学理性引领时代的潮流〔131〕 自然科学方法长入人文领 域〔133〕 历史学对自然科学的回应〔134〕	131

第二节	伏尔泰理性史学的认识特征	137
	可知的历史与不可知的历史〔137〕 历史发展的有序性〔140〕	
第三节	伏尔泰历史认识中的方法论根源	142
	牛顿自然哲学对伏尔泰的影响〔142〕 培根方法论的影响〔147〕 洛克方法论的影响〔153〕	
第五章	让哲学的明灯照亮黑暗的历史	163
	——伏尔泰历史哲学学院	
第一节	历史哲学的初次提出及其歧意	163
	历史哲学的首次提出〔163〕 历史哲学的争论〔166〕	
第二节	伏尔泰历史哲学的内涵	167
	伏尔泰的几种概述〔168〕 所谓“哲学”〔169〕 文化学的内涵〔170〕	
第三节	伏尔泰历史哲学蕴含的丰富思想	171
	历史是什么〔171〕 历史学的价值〔173〕 历史的法则〔176〕 历史动力论〔180〕	
第六章	风俗,时代精神、文化史	190
	——伏尔泰的文明理论	
第一节	文化史	190
	人类的风俗〔190〕 历史的时代精神〔195〕	
第二节	人类文化史的第一次全景式叙述	199
	《风俗论》“导论”:文化史的纲领〔200〕 《风俗论》对文化史内涵的全面诠释〔203〕	
第三节	文明理论	217
	文化史之父〔218〕 文明史与文化史的汇通〔219〕 伏尔泰著作中的文明理论〔223〕	
第七章	耶稣会士是编不好历史的	238
	——伏尔泰的历史编纂思想	
第一节	论古代史编纂中的错误	238
	以往历史著作存在的不足〔238〕 探索造成古代史著作缺陷的原因〔243〕	

第二节	伏尔泰古史批判的条件	249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史学研究中的批判方法〔249〕 历史文献的社会化和精细校勘〔252〕	
第三节	伏尔泰的历史编纂思想	256
	历史编纂的出发点和原则〔256〕 历史编纂中的方法论思想〔258〕	
第四节	历史编纂中的辨史方法	262
	《风俗论》中体现出的辨史方法〔262〕 《路易十四时代》中体现出的考史方法〔268〕	
第八章	罗马的衰亡和开明君主	277
	——伏尔泰的几个历史论点	
第一节	论古代的罗马和意大利	277
	对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讨论〔277〕 西罗马帝国衰亡后意大利不能统一的原因〔279〕 史学影响〔280〕	
第二节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	282
	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282〕 封建制度史的开拓者之一〔284〕	
第三节	由历史研究而总结出的政治观念	290
	开明君主制〔290〕 民主政治〔295〕	
第九章	世界历史由中国开始	301
	——伏尔泰的中国观	
第一节	伏尔泰中国知识的来源	301
	传教士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301〕 中国道德的最大鼓吹者〔303〕	
第二节	伏尔泰的中国认识	306
	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国〔306〕 政治的道德基础:儒家文化〔308〕 宗教:理性的伦理 道德哲学和宽容精神〔310〕 开明专制政体的典型〔321〕 社会生活:先进与落后并存〔315〕	
第三节	伏尔泰中国观的时代意义	319
	中国礼仪之争与伏尔泰的中国认识〔319〕 伏尔泰的批判〔322〕 中国的发现与对基督教神学基础的批判	
后记		331

绪 言

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中,伏尔泰是一个响彻欧洲的名字,他不仅是启蒙运动中最为杰出的启蒙学者,还是法国启蒙学者们的精神领袖,而且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君主,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学者,都前往或向往到伏尔泰长期居住的费内纳拜见这位“费内纳教长”,以至于人们将从他发表《哲学通信》的 1732 年起,到他逝世的 1778 年这段时期,称为“伏尔泰时代”。他逝世后,人们又以持续不断地刊印他的著作,作为继续宣传他的启蒙思想和对他的怀念。1784 年,伏尔泰生前最年轻的启蒙学者、朋友博马舍就开始着手编辑伏尔泰全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 1789 年完成出版。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又重新整理、编辑和出版了伏尔泰全集,1885 年又有由莫兰主编的新一版《伏尔泰全集》的全部问世。到 20 世纪,从 1968 年起,由贝斯特曼主编的《伏尔泰全集》又陆续出版。1978 年,为纪念伏尔泰逝世 200 周年,法国还出版了多卷本的伏尔泰批注《全集》。这一系列的出版工作推动了欧洲各领域的学者们对伏尔泰思想的研究。对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卓越贡献及他的历史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之外,德国学者莱辛在伏尔泰陆续发表《风俗论》的各篇章时,就对伏尔泰的史学思想作了报导,称他的历史著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至此伏尔泰历史思想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中心议题,而且研究热忱就一直未曾减退;至今伏尔泰的历史思想仍是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欧洲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史学思想时,都必然谈到伏尔泰,许多经典著作都针对他的历史著作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进行剖析。

一、20 世纪西方伏尔泰历史思想研究简况

20 世纪前半期,西方史学界对伏尔泰历史思想所做的研究和评价,其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伏尔泰在史学史上的定位、他在史学上有何创见、史学思想(理论)特征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英语国家中,在美国以倡导“新史学派”面貌出现的著名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于 1911 年出版了《新史学》一书。在书中从两个方面对于伏尔泰史学思想作了简短的评说。首先承认伏尔泰于 1765 年写的《历史哲学》是一部受到大众欢迎的著作,并且影响力所至的结果是“18 世纪有大批的历史哲学著作出现”;第二,他也明白指出伏尔泰历史写作的动机是专门攻击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宗教,他的《风俗论》不过是“他从‘大货栈’里拿取了他的反对现状的运动所需要的东西。”就此两方面来说,如果考虑到伏尔泰之前,人们用教会史著作当世界通史的标准教科书达千年之久的状况,鲁滨逊认为这种写作动机还是可行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写作对于史学发展来说,伏尔泰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历史理论,他只不过选出许多所谓“有用的真理”。^[1]

1913 年,英国著名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出版了他那部后来享誉欧美的史学史专著《19 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这部研究 19 世纪史学的“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中,古奇花了一定篇幅论述 18 世纪的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论及到伏尔泰。在这里,他告诉人们,“法国已经从博絮埃的天下转移到伏尔泰的时代”。因为在他看来,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在对过去的史料和传统的风尚方面,“采取了崭新的态度”,而要达到此目的“仅凭博学是无能为力的”。但这一切在 18 世纪的实现,“则主要是伏尔泰”。^[2]如果考虑到该书的中心是总结 19 世纪历史研究的成就,而它与 18 世纪史学必然的有一种渊源联系的话,那么古奇对伏尔

泰的评价意义重大,他在新世纪一开始,就为人们描绘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形象。他在书中重点评述了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的历史价值,认为是创立了一个“文化史”的新类型,它们的新颖之处在于书中所著目的史事是道德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的生活,其“主题是人类思想的历史。”^[3]他在书中还专用一章讨论19世纪的“文化史”研究,强调他们都是伏尔泰史学思想在本世纪的实现;^[4]用文化史来结束全书,其对20世纪的指向就意味深长了;如果再从19世纪后期由泰勒开始而劲头正盛的“人类文化学”兴起的背景看,可以说古奇对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开辟“文化史”领域的评价,就潜藏有更多的美誉了。

鲁滨逊和古奇对伏尔泰的评价,显然只是局限在伏尔泰史学家的地位上,未曾对其史学思想作更深入的揭示。20世纪初,两种史学思想占据了史学家们的头脑。一个是盛大于19世纪以启蒙思想反其道而行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此时依然是许多学者认识历史和评价思想的武器,另一个是萌生于19世纪末并蒸蒸日上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的思想就是在反对启蒙思想的普遍理性观上产生的,后者继承了它的观点,并由此导致史学思想领域中另一问题的提出,就是历史是可知的?开创了历史可否被人认识的观念的讨论。对于伏尔泰研究来说,这两种思想的合流不仅对其在史学史上的定位、他在史学上有何创见、史学思想(理论)特征等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尤其针对伏尔泰历史思想中用理性的普遍性概括和预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这两个被“历史哲学”概念所涵盖的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出发点纷纷提出了积极地、反思的或批判性的然而都是忠诚的评价。在这众多的研究者中,如下国家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1912-3年,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在意大利各种学术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有关历史学的论文,^[5]在其中的“启蒙运动的史学”一章中,就是对伏尔泰史学思想进行的专题研究,他

对其史学思想所作的评价,比19世纪学者有了更为全面的解释。首先,他视伏尔泰为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说:“在所有最聪明同时又最优秀的历史方面的启蒙代表人物中,我们可以伏尔泰为例。”^[6]第二,他指出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中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所宣扬的“进步的历史观”;在肯定“进步史观”的同时,也就此观念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他认为进步史观所提出人类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的思想具有宗教性质,“因为他用俗人的措词重复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就是真理和正义(世俗的上帝)、关于尘世和天堂、千年至福说等等概念。”^[7]克罗齐被这种强烈的进步愿望有所警惕,以至于引起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整个世纪的纲要。现在是幸福的,甚至在革命的屠杀中也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而对产生现在的过去则充满了蔑视与嘲弄。”^[8]他还看出了伏尔泰由于从进步的信条出发,导致其重视现世而忽略过去的历史倾向,这是后来许多学者同声共气地叱责伏尔泰“反历史思想”的先声;同时也指出,这一观念的提出有其史学目的背景,就是伏尔泰历史学的实用主义目的。

克罗齐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时期的代表人物,因此,在他对伏尔泰上述亦褒亦贬的评价风格中,论及到了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指出其“唯一的前提是理性,”具体的事实是“民族精神”,评价它完全是一种新输入的概念;但又强调他的历史哲学在对历史可否认识上包含了不确定性,说伏尔泰认为历史知识“只能用作‘很可能’的意思。”^[9]不过,在整体上,克罗齐肯定了这一概念后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后人在伏尔泰那里继承或捍卫了由伏尔泰开创的文化史、世界史的历史编撰方法及对印度和中国历史的态度。最后,他强调伏尔泰史学鲜明世俗精神和反神学的特色。除这些之外,克罗齐还对一些次要的思想也有所论及,如对伏尔泰史料的处理上,认为伏尔泰开创了另一种——对文学、道德、政治和军事方面经验——更为本质的批判,他说“我们佩服伏尔泰(尤其是

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不信任朝臣们和臣仆的报导”;^[10]而对伏尔泰在历史著作中所赞颂的开明君主上,虽然认为它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但伏尔泰却以理性为出发点,就不如马基雅维利从人性的弱点展开显得有说服力。在今天看来,克罗齐评价了伏尔泰史学的所有主要方面,应该说是在20世纪初期的评论中最为全面的一位学者了。

关于伏尔泰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定位,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18世纪末德国学者赫德尔就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开始了对伏尔泰著作的否定。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学者R·G·科林伍德可谓是20世纪的赫德尔!与古奇和鲁滨逊两个英美作家相比,他对伏尔泰的史学思想没有给予什么赞扬。科林伍德从1936年起,写下了一系列的历史哲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在1946年他死后三年以《历史的观念》一书出版,成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集成,书中也将其对伏尔泰史学的观点展示出来。他在论及历史写作的目的时,评价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作为启蒙史学中“最好的和最有特色的表现,”^[11]但是这种评价是局限于伏尔泰历史著作中强烈的反宗教色彩上的。就此而言,科林伍德较克罗齐更看重伏尔泰这一突出之处;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他批判了伏尔泰的历史写作的不严肃性,只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认为伏尔泰历史写作“并没有企图把历史写作提高出宣传的水平之上……”因此,在对伏尔泰史学的目的上,与其说是褒奖,不如说是针砭。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伏尔泰历史写作的方法于历史写作也无助于补。他认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对宗教的论战太激烈而片面了,由于视以宗教思想为核心的中世纪是非理性而将其从历史中排除,这不是一种对人类历史的真正的观点,而是反历史的。因此,这种史学“对改进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所做的是微乎其微的。”^[12]循着这一方向,他指出了伏尔泰史学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的本原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史学是建立在无源之水上,他说“这些作家

不可能有关于历史起源或过程的概念。”^[13]因为他们既然视中世纪是非理性的,理性就不可能从非理性的中世纪中导致出来,那么理性的现代历史缘何而来呢?同时,他分析伏尔泰“民族精神”的观念往往通过杰出人物或思想才能体现出来的思路,指出伏尔泰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的典型。

科林伍德在上述几个历史哲学的重要方面质疑了伏尔泰的历史思想,但也明智地指出伏尔泰史学思想为历史写作做出了某些确切的进步。如针对以往历史著作以宗教神学思想一统天下的卫道性,启蒙史学就充满了宽容的精神;更突出的是,伏尔泰在历史题材上把科学和艺术、工业、贸易和一般的文化的历史“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显赫地位”;还有,科林伍德没有像克罗齐等众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因启蒙学者强调理性的普遍原则而非难其可能,他真诚地赞赏伏尔泰等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尽管他觉得他们还显得浮浅,但在历史中“确实是在探索原因”,他认为正是在这个方面,伏尔泰等就超越了他们的局限性。仅凭科林伍德从这一角度的评价,他对伏尔泰史学思想以上的责难,就算不了什么了。

在德国,恩斯特·卡西勒以《启蒙哲学》一书,树立起研究 18 世纪启蒙思想的权威。该书在 1932 年出版后,即成为同类题材的经典著作,书中专辟名为“征服历史领域”一章,谈论到 18 世纪的历史写作,尤其分析了伏尔泰的历史思想。在这里,卡西勒以他睿智的洞察力和极具思辨的阐释,为自世纪初以来伏尔泰历史思想所蒙受的诋毁进行辨白。他认为伏尔泰的《风俗论》创立了一个历史学的世纪,他说伏尔泰“在历史领域勇敢地制定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方法论方案,他的《风俗论》为这一方案铺平了道路。此后 18 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在这一哲学成就的影响下写成的”^[14]他针对人们批判伏尔泰在历史中以理性说明一切历史现象为幼稚的观点不以不然,认为这恰恰是他叙述的特殊魅力所在,他高度称颂伏尔泰“是重新创造并体现了伟大

的历史杰作的典范的思想家。”。对自己的评价他是有充足的理由,他认为在评价伏尔泰历史思想时,用后来的理论体系要求对伏尔泰是不公平的,他从历史条件出发申辩说:“18世纪历史观与其说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已完成了的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朝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15]这就将人们强加在以伏尔泰身上的“反历史”的论点,转换了一个方向,让人们明白伏尔泰历史写作对18世纪的影响力在于历史的目的上,“正是把历史提高到超出‘过分人格化’、偶然事件和纯粹个人的水准。……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联系。”^[16]因此,说伏尔泰历史思想中有“反历史倾向”的这看法,从历史看是没有根据的。为澄清反历史的误解,卡西勒进一步地发挥他的论辩,认为正是在伏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中,“探讨了历史的‘可能性的条件’”。^[17]因为伏尔泰采取了自然科学家相同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家的工作的,像科学家确定自然一样确信历史的可能。用同样的辩论方式,卡西勒还为伏尔泰历史思想中的探索历史规律的思想进行了辩解,称颂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隐藏的规律。卡西勒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观方面,都从积极的方面为伏尔泰申辩。

卡西勒甚至在许多细微处都为伏尔泰开脱。如许多史学家都指责伏尔泰在历史写作时,一方面要在历史中表现人类的伟业这种过于志大的题目而史实疏空,另一方面,为印证自己的思想而在处理史料时又常常粗糙,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实之处。而卡西勒则反驳说:“伏尔泰在这一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少屈从于纯粹显示才气的危险,因为他用广泛而透彻的研究增强自己的论点,并且他也并非不擅长作详尽的历史考察。”^[18]既然在这些细微处,卡西勒都向人指出伏尔泰历史思想的长处,那么,不管是在对伏尔泰历史思想中挑毛病还是欣赏者都众口一词称赞的“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观念上,卡西尔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1942年,美国出版了由J·W·汤普森著的《历史著作史》。在这部规模巨大,资料鸿富的著作中,第38章题为“理性时代”,其中就对伏尔泰的史学思想做出评价。在这里,他没有给伏尔泰过多的笔墨,对他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没有提供比之前的作家更多的见解,只是在书中引用了许多史家的评论,可以算做是20世纪前半期对该专题的一次总结。他一开始就感慨伏尔泰有如此多的历史著作和有吸引住了不可胜数的读者,说伏尔泰的历史著作是为全欧洲整个知识界写的。然后,他重申了之前研究者们的共识,认为伏尔泰在两个方面为历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创立了把全世界各文化中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历史写作模式;第二,作为文化视野中历史是诸如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记录。对于伏尔泰史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缺憾,也是引用如像克罗齐那样的作家以往已经讨论得太多的观点,他只是再一次告诫读者伏尔泰的这些不足。如他引证罗伯特·H·穆雷的观点说伏尔泰的历史观中“没有历史连贯性,对中世纪史有深刻仇恨”的非历史观;引用克罗齐的观点说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判断充满偏见的气味;他认为伏尔泰在解释历史事实时“既缺少哲学方面的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真知灼见。”^[19]这样鲜明的结论是他超越以往史家众观点的地方。不过,汤普森没有再重复以往许多学者对伏尔泰思想争论得最激烈的理性规律思想的批判。

从二战后直到世纪末,伏尔泰仍然是西方史学家关注的话题。但与战前的认识重心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之前所关注的对伏尔泰“以理性为表现的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则”的激烈批评,这时偃旗息鼓了。这大至与19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占主导思想的浪漫主义影响消退相关,也是历史哲学——不管是思辨的还是分析的——的历史思想话语霸权地位在战后逐渐丧失所至。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生活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使人们对18

世纪工业革命所张扬的科学理性深表怀疑,自然也影响到史学家再也不会对理性主义史学多动脑筋。种种因素使过去热门的话题渐成冷门。第二,伏尔泰历史思想中所饱含的文化史和世界史观念再度被人们所张扬。自年鉴史学派历经数载的奋搏后在欧洲确立了一方霸权,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研究世界史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思想取得的成功,使史学界感受到冲击,继之而起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以及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掀起“体系史”和“文化史”的浪潮,伏尔泰的史学思想经过冷漠后重又进入了历史学的热闹话题,因为从学术渊源上,人们看出,他们的世界历史一体的观念和文化史观,都可以在伏尔泰那里找到依据。于是,对伏尔泰文化史和世界史思想的研究再度出现在欧美史学家的著作中。

这种思想倾向一开始就表现在二战前夕流亡到美国的德国学者卡尔·洛维特身上。他早年在德国的学习经历,在历史思想的学术背景上受分析的历史哲学影响是肯定的。但是,在1954年他所完成的一部对历史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世界历史与被救赎的历史》一书中,对伏尔泰的认识只专注在文化史和世界史两方面。他指出伏尔泰的“历史观以发现历中国史为条件,”认为伏尔泰在1764年发表的《历史哲学》在讨论了中国的人道文明之后,又着手研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然后是罗马与基督教的兴起,“在所有这些引人入胜的……描述中,他明确的是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话。”^[20]可见,洛维特一方面揭示的是伏尔泰所写的历史在事实上重视的是“人道的文明”历史,在范围上又将东西方熔铸于一炉的世界史观念。而对于之前争论得火热的“理性进步的规律”和“历史可否认识”不置一词。反而在分析伏尔泰怎样将人类进步的方向从基督教神学的天国理想,翻转为世俗的进步观念时,指出伏尔泰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进步主义者。因为他发现“伏尔泰太聪明了,他不会过分夸大进步的理念。他信仰的是一种温和的

进步,只要理性没有实现完全的统治,这种进步就会为周期性的倒退所打断。”^[21] 络维特的观点成为 60 - 70 年代研究伏尔泰的基调。1975 年,纽约州立大学著名的欧洲史学史和思想史专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在其《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评论说:伏尔泰“试图克服那种狭隘地注重事件的政治史,而立志撰写一部博采兼收的社会文化史,”^[22] 1978 年,他又在其编辑的西方学者有关史学诸问题的讨论论文集,从历史研究的视野方面,再次肯定了伏尔泰历史写作的世界史眼光和文化史内涵对于 18 世纪历史写作的贡献,认为“有意识地冲破古代经典著作的狭隘范围的尝试,伏尔泰为一个新方法提出了一个模式,其目的是一种最广义的文明史。”^[23] 反映了这一时期复活了伏尔泰历史思想中“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观念。

这一思想复活的另一个典型就是美国学者 B·A·哈多克。他在 1980 年出版了其《历史思想导论》一书。他重点评价了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认为由于伏尔泰在书中评价路易十四在政治经济上应用了理性原则和对艺术、科学的庇护,书中只关心人类天才和风尚,因此它“为文化史吹响了嘹亮的号角。”^[24] 哈多克在这里有一个独特的观念,他将文化史又表述为“文明史”,他说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使用了文明社会的概念,作为衡量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尺度。”^[25] 同时,他也鲜明地指出由于伏尔泰对文明史写作的需要,在逻辑上必然追求世界史的方式,并扩大了世界史的范围。他认为研究社会和文化史的倾向,使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自己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还缠绵不舍的政治史情怀中解放出来,“把中国、印度、伊斯兰文明包括在纲要里。这样,他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来纠正支配着哲学和神学理解往事的普遍观念。”^[26] 在书中,哈多克没有对伏尔泰“历史理性普遍性”问题多作纠缠,却指出了伏尔泰历史理性普遍性的思想来源。认为是洛克为伏尔泰提供了认识论,牛顿为他提供了方法论。这是